

中韩民众间的相互认识以及好感度影响因素

王晓玲*

요약

이 연구는 한중 양국 국민을 상대로 실시한 “중국 인식”과 “중국 인식” 설문조사 결과를 토대로 해서 양국 국민간의 상호 인식 및 상호 호감도를 비교하고 호감도 영향 요소에 대해서 분석하고자 한다. 더 나아가서 한중 민간 감정에 악영향을 미치는 요소들에 대해서 중점적으로 분석하고 대처 방안을 고민하고자 한다. 연구 결과는 다음과 같다. 한국 응답자들의 눈에 비친 중국은 다양한 면에서 낙후된 나라이다. 중국인, 한중 협력에 대한 불신이 크고 사회주의 중국이 덜 개방되었다고 생각한다. 하지만 중국은 발전이 빠른 나라라고 보고 중국 문화에 대해서 친근감을 가지고 있다. 중국의 낙후성 그리고 중국에 대한 불신은 중국 호감도를 낮추는 요소이며 중국의 발전성과 중국 문화에 대한 친근감은 중국 호감도를 높이는 요소이다. 중국 응답자들의 눈에 비친 한국은 다양한 면에서 선진국이며 이런 인식은 한국 호감도를 높이고 있다. 하지만 중국 응답자들이 한국의 문화 산업을 인정하는 동시에 중국 전통 문화에 대한 강한 자부심을 가지고 있으며 한국인이 민족주의가 너무 강하고 너무 거만하다고 평가한다. 이런 인식은 한국 호감도를 낮추는 요소이다.

주제어: 한국과 중국, 여론조사, 상호인식, 상호 호감도

*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社会学博士。

I. 序言

今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回顾20年的中韩关系，很多专家形容两国由蜜月期进入了磨合期。建交之初，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相互认识认识都是积极的，但从2000年的“大蒜风波”开始到今天，中韩双方发生在经济、安保、政治与文化领域里的摩擦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应该在20年交流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双方的立场差异与利益诉求，这将有助于中韩关系在今后走向成熟稳定。

在中韩关系中，经济合作是火车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间贸易规模的增长屡次超出政府预测。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果更多的是遵循市场自然规律，当下两国间经济互补大于竞争。建交以来，两国政府一直积极提升中韩关系。中韩合作有益于朝半岛的稳定、有益于两国经济发展、有益于两国国民的福祉，两国的合作需求大于争端，因此两国政府维护双方关系的基调不会变。与经济以及政府领域的合作不同，中韩民间感情的风向标与国家整体利益取向经常存在差异¹⁾。中韩关系发展到今天，明显具有了经济热、政府温、民间冷的特点。民众之间的相互认识受很多非理性因素甚至是错误信息的影响¹⁾，一经形成，危害非常严重。首先，民间负面感情会阻碍两国政府间以及经济领域的合作，中韩之间的高句丽历史归属之争就曾上升为政府间议题，今天中韩FTA的签署也要过民意这一关。其次，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负面情感一旦形成，会左右其看待对方的视角，会形成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负面的刻板印象会伤害中韩合作的互信基础，不利于中韩关系的长远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韩外交的舞台由多人群、多层面、多领域组成。韩国外交通商部的统计显示，2011年往返于中韩之间的两国国民超过640万人次，两国教

1) 例如中国报纸和互联网上关于“韩国抢夺中国端午节”的报道并不准确，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江陵端吾祭”与中国的端午节并不完全相同，“韩国教授考证李白是中国人”的报道则是假新闻。中国媒体热议此类问题，是2008年前后引发厌韩潮流的重要原因。

育部的统计也显示,来华留学的韩国留学生与在韩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超过6万人。两国民众在中韩外交中的参与度较高,在研究中韩关系时民间感情值得我们关注。

本研究以分别在中国和韩国进行的两项调查结果为依据,对比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并着重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相互之间的好感度,以期为思考中韩民间关系的未来提供实证依据。

II. 调查数据说明

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笔者以“韩国形象”为题,面向生活在大连、北京、青岛、上海、广州5个城市里13岁以上的普通中国人进行了调查,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3291份。问卷调查采取一对一面访形式,在考虑不同生活空间(初中、高中、大学、公司、工厂、居民区)、性别和年龄层比例的情况下首先确定被访者比例分配,然后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完成了问卷调查。2010年2月,以“中国形象”为题,面向19岁以上生活在韩国全国的普通韩国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00份。在选取调查对象时以2009年12月韩国登记人口的性别、年龄、居住区域分布为依据,进行了多级分层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采用了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方式。

本研究从上述两项调查中选取了针对19岁以上北京被访者和首尔被访者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首尔被访者样本总数为213例,其性别、年龄层结构与韩国2009年12月首尔登记人口的性别、年龄层比例大致相同。北京被访者样本总数为861例,与北京市2005年底常住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相比,其中19-29岁年龄层的比例较高,50岁以上年龄层的

比例较低。²⁾ 本研究使用SPSS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针对北京被访者实施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08年7月至11月,而此时正是“厌韩”情绪高涨的时候,如果在平常年份进行调查,得到的韩国认识应该更积极正面。针对首尔被访者实施问卷调查时中韩关系较为平稳,反应的是近年来一般情况下韩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

两项调查研究在实施问卷调查之前都分别进行了访谈研究,在中国以一对一深层访谈的形式进行,在韩国以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进行。两国研究的访谈提纲与访谈进行方式相似,都要求被访者首先回答对对方国家的第一联想,然后要求被访者对对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国民、社会、政治以及中韩关系进行评价。两项调查都以访谈研究的结果为基础设计了问卷。中韩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了解程度不同,对对方国家不同领域的熟悉程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评价角度不同。例如中国被访者熟悉韩国文化与韩国商品,对韩国的其他方面了解较少。韩国被访者熟悉中国经济,对中韩在朝半岛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也很关心。再例如,同样要求被访者对对方国家的国民进行评价时,两国被访者的评价角度以及所使用的词汇完全不同。因此,两个调查的问卷虽然设计框架相同,都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商品、国民、中韩关系、国家影响力评价、国家好感度评价等几方面内容,但为了呈现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实际认识,两个问卷的具体问项设计并不相同,而问项设计的差异本身也体现了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认识的差异。³⁾

2) 北京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底北京市区常住人口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占50.6%,女性占49.4%,在19岁以上人口中,19-29岁占22.8%,30-39岁占21.8%,40-49岁占22.4%,50岁以上占32.9%。本研究所使用的北京样本中男性占54.8%,女性占45.2%,19-29岁占43.3%,30-39岁年龄层占20.1%,40-49岁年龄层占17.4%,50岁以上年龄层占19.2%。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05年底首尔市人口10%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占 %,女性占 %,在19岁以上人口中,19-29岁占 %,30-39岁占 %,40-49岁占 %,50岁以上占 %。本研究所使用的首尔样本中男性占48.8%,女性占51.2%,19-29岁占22.6%,30-39岁占23.0%,40-49岁占21.1%,50岁以上占33.3%。

3) 针对中国人的调查问卷具体内容参见王晓玲(2009, 81-87),针对韩国人的调查问卷具体内容参见董向荣等(2011, 200-204)等人的研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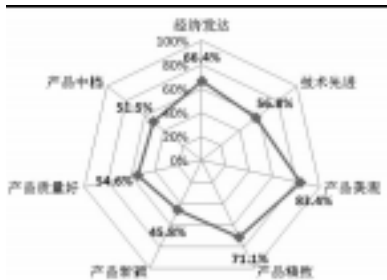
Ⅲ. 中韩国民的相互认识

1. 对对方国家经济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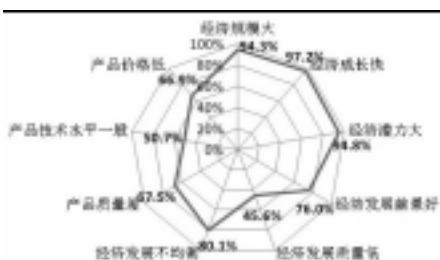
中国被访者对韩国经济只有一个“中等国家”的大概认识，对韩国经济的特点、存在问题以及发展前景等知之甚少。对于韩国产品，中国被访者认为其具有外观漂亮、精致的特点，其创新性、质量和性价比也得到了很多被访者的认可，但产品定位与其国家发展水平一样，都被中国被访者定位为中档。(参见图1)

与中国被访者相比，韩国被访者对中国经济更为了解。90%以上的被访者都知道中国经济规模大、成长快、发展潜力大，80.1%的被访者知道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近半数的韩国被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低。在韩国被访者心目中，中国产品低价而且劣质。(参见图2)虽然韩国被访者比较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特点，但对于中国经济具体发展成就并不清楚，对中国GDP规模的估计大大低于实际情况。在进行该调查的2009年，中国GDP在全世界排第3位，接近第2位的日本，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GDP排世界第“4到5位”的被访者占14.1%，认为排第“6到10位”的被访者占16.4%，认为排“11-20位”的占16%，认为排“21位以后”的占18.3%。换言之，大半数韩国人对中国GDP的认识仍停留在中国10年甚至20年前的水平。

〈图1〉中国人眼中的韩国经济与韩国产品



〈图2〉韩国人眼中的中国经济与中国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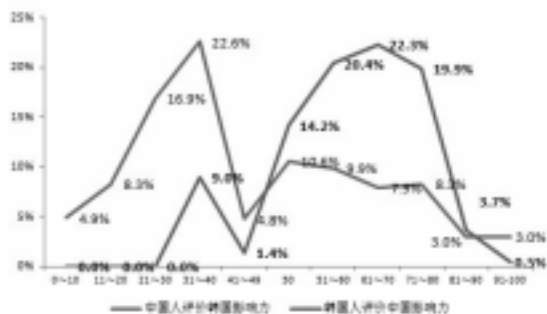


2. 对对方国家影响力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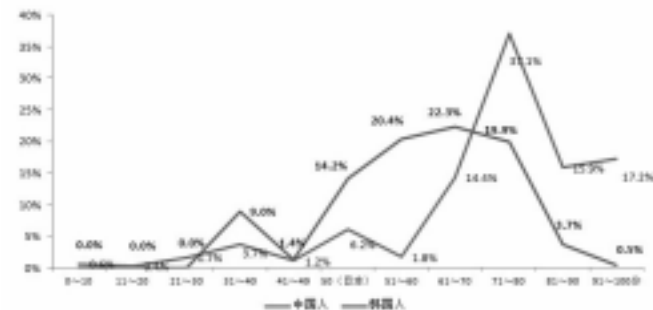
中国被访者认为韩国的国家影响力低于中国，也低于日本，韩国被访者也认为中国影响力高于日本，但是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明显低于中国被访者的评分。

在将日本影响力定为50分的前提下，中国被访者在0至100分之间对韩国影响力进行了打分，结果显示韩国影响力平均评分为46.9分。半数以上(57.5%)中国被访者认为韩国影响力低于日本，10.6%的中国被访者认为韩国影响力与日本相同，认为韩国影响力高于日本的被访者占31.9%。在将日本影响力定为50分的前提下，韩国被访者在0至100分之间对中国影响力进行了打分，结果显示中国影响力平均评分为60.9分。认为中国影响力低于日本的被访者仅占10.4%，14.2%的被访者认为中

〈图3〉中韩被访者对方国家影响力的评价



〈图4〉中韩被访者对中国国家影响力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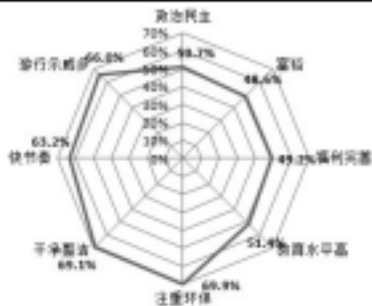
国影响力与日本相同，在51至80分之间集中了大部分被访者，占有所有被访者的62.6%。(参见图3)

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中国被访者的评价高于韩国被访者。在把日本的影响力定为50分的前提下，问卷中要求被访者在0到100分之间对中国的影响力进行打分，结果显示中国被访者对中国影响力的平均评分为75.7分。认为中国影响力低于日本的被访者非常少，仅占7.6%，认为中国影响力与日本影响力相同的被访者也很少，占6.2%，认为中国影响力在71-80分之间的被访者最多，占37.1%，其次17.2%的被访者认为中国影响力在91-100分之间，15.9%的被访者认为中国影响力在81-90分之间，14.4%的被访者认为中国影响力在61-70分之间，61-100分之间集中了84.6%的被访者。(参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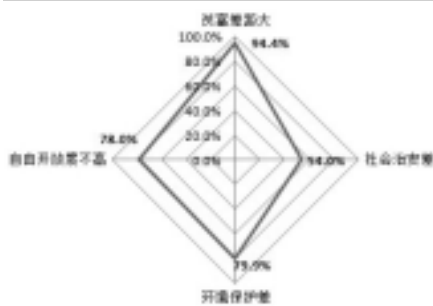
3. 对对方社会的评价

中国被访者对韩国社会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先进、充满活力、民主参与度高，具体评价包括干净整洁、注重环保、快节奏、平均教育水平高、富裕、政治民主等。(参见图5)韩国被访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可以概括为落后、问题多、不够开放，具体评价包括贫富差距大、环境保护差、社会治安差、自由开放度不高等。(参见图6)

〈图5〉中国被访者眼中的韩国社会



〈图6〉韩国被访者眼中的中国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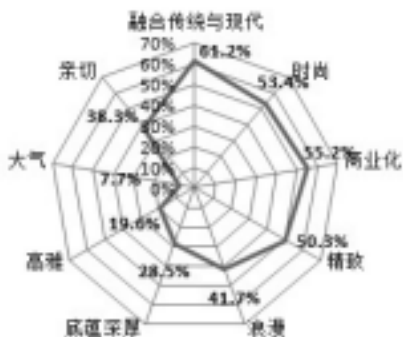
4. 对对方文化的评价

在中国被访者眼中，韩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与现代融合”。通过访谈，笔者发现韩国的流行音乐、服装等“韩流”文化给中国人留下了“时尚”以及“商业运作成熟”的印象，韩剧则使被访者们认为韩国文化充满了“精致”和“浪漫”气息。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气质也被认为是女性化、年轻化和商业化的，称不上“高雅”和“大气”，缺少“文化底蕴”。(参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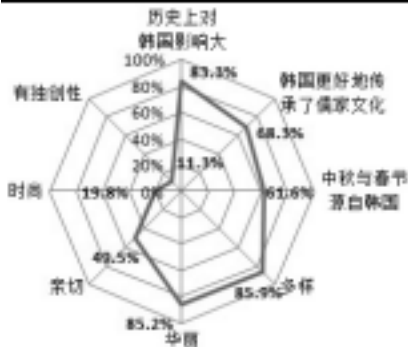
韩国被访者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予肯定，承认历史上中国文化先进而且影响了韩国，但是被访者认为韩国更好地传承了儒家文化。对于中秋、春节等两国共有的文化，大部分被访者(61.6%)不认为发源自中国。对于当下的流行文化，被访者们认为中国落后于时尚、缺乏独创性。(参见图8)

历史上长久的文化交流使两国被访者中都有很多人对对方的文化感到“亲切”。作为文化接受国的韩国，其国民对与中国文化的亲缘感很强烈，49.5%的韩国被访者回答对中国文化感到“亲切”。

〈图7〉中国被访者眼中的韩国文化



〈图8〉韩国被访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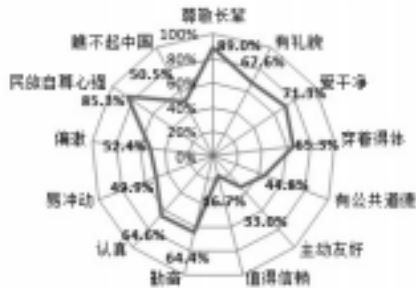
5. 国民间的相互评价

中韩两国被访者评价对方国民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对方国民“民族自尊心强”并且“难以信赖”。中国被访者认为韩国人干净、衣着得体、彬彬有礼、勤奋，但有着午慢、不够友好等缺点，韩国被访者眼中的中国人脏、懒惰、午慢、阴险、精于算计而且以自我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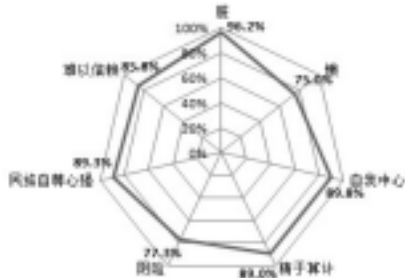
中国被访者对韩国人最为一致的认识是“民族自尊心强”，但这并非正面评价。访谈中，被访者们称他们认为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过于偏执，瞧不起中国，把“端吾节”、“孔子”等中国文化都说成是韩国的。访谈还发现，很多被访者通过韩剧看到韩国人“爱干净”、“穿着得”体并且“有礼貌”。北京生活着很多韩国人，他们是北京人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被访的北京人认为韩国人在交往中“不积极主动”。中国被访者们还认为韩国人“勤奋”、“工作认真”，但“容易冲动”、“难以信赖”，访谈中发现与韩国人在工作中存在合作的被访者们尤其强调韩国人容易冲动和“难以信赖”。(参见图9)

韩国被访者对中国人的评价都是负面的。韩国被访者也认为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强，访谈中被访者提到中国人具有“大中华”情节，对周边小国态度午慢。在韩国被访者眼中，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很低，表现为卫生状况差、只顾及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感受。韩国被访者提到中国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阴险”、“精于算计”等性格特征，访谈发现，这些

〈图9〉中国被访者眼中的韩国人



〈图10〉韩国被访者眼中的中国人



评价是在韩国口口相传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的一部分。受这些“刻板印象”的影响，韩国被访者对中国人持有一种受害意识，认为中国人难以信任。(参见图10)

6. 对中韩关系的不同认识

中韩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虽然不断升级，但中国被访者给出的评价却很平淡，介于“好”与“一般”之间，并且明显认识到中韩民间关系比政府间关系差。认为中韩关系“好”的被访者占49.0%，认为中韩民间感情“好”的被访者占39.9%。认为两国关系“一般”的被访者占42.9%，认为中韩民间感情“一般”的被访者占“43.6%”。

韩国被访者对中国持有怀疑和警戒。韩国被访者中认为中国对韩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占了79.8%，认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被访者只有8.9%。对于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所作的努力，只有半数(50.7%)被访者认为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韩国被访者虽然非常关心中韩经贸合作，但也同中国被访者一样低估了中韩经贸交流的重要性。知道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顺差国的只有50.2%，分别有33.8%、6.1%和5.6%的被访者依次认为美国、欧盟和日本是韩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中韩经贸交流有益于两国经济发展，韩国也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看作重要的发展机遇，但韩国被访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却多于期待。43.6%的被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威胁大于机会，34.1%的被访者认为一半是机会一半是威胁，认为机会大于威胁的仅占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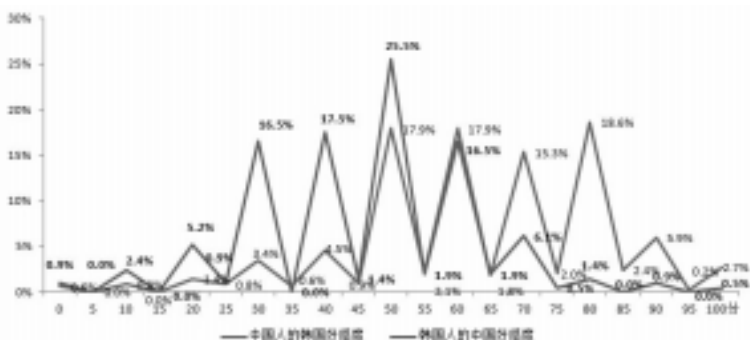
IV. 相互好感度以及影响好感度的因素

1. 好感度得分对比

我们把对日好感度定为50分，要求中国被访者在0到100分之间对韩国好感度打分，韩国被访者在0到100分之间对中国好感度打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被访者的韩国好感度明显高于日本好感度，而韩国被访者的中国好感度则低于日本好感度。考虑在中国实施调查时正是中国“嫌韩流”最为强烈的时候，而在韩国实施调查时中韩民间关系却比较平稳，因此我们更可以肯定，以日本为参照的情况下，中国人的韩国好感度要高于韩国人的中国好感度。

具体来看，中国被访者的韩国好感度为平均63.4分(标准偏差为18.5)，明显高于日本好感度，也高于韩国被访者的中国好感度平均分46.1分(标准偏差为16.5)。13.2%的中国被访者的韩国好感度低于日本，而韩国被访者中中国好感度低于日本的占44.8%。17.9%的中国被访者的韩国好感度与日本相同，69.0%的中国被访者的韩国好感度高于日本，而韩国被访者中中国好感度高于日本的只有29.7%。中国人的韩国好感度主要集中在50到80分之间，这一分数段集中了75.6%的被访者，而韩国人的中国好感度主要集中在30到60分之间，这一分数段集中了79.2%的被访者。(详见图11)

图11 韩国人对华好感度与中国人对韩好感度比较⁴⁾



4) 大部分被访者以10分为单位进行了好感度评分，少数被访者以5分为单位，极少数被访者以1分为单位进行评分。为了便于展示，图11中把0-2分统计作0分，把3-7分统计作5分，8-12分统计作10分，依此类推。

2. 好感度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中国被访者韩国好感度的因素

为了了解构成“韩国认识”的各种变量与韩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笔者进行了T-test 或者ANOVA分析，分析结果概括总结为〈表1〉。

〈表1〉“韩国认识”变量群与韩国好感度变量之间的T-test、ANOVA分析结果

	“韩国评价”变量群	与韩国好感度变量的关系	
对韩国经济的评价	经济发达*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技术先进*	不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对韩国产品的评价	质量好*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新颖*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美观*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精致*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产品中档*	不显著	-
对韩国社会的评价	富裕*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干净整洁*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教育水平高*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政治民主*	不显著	-
	福利完善*	不显著	-
	注重环保*	不显著	-
	快节奏*	不显著	-
	游行示威多*	不显著	-
对韩国文化的评价	精致*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浪漫*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时尚*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大气*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高雅*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融合传统与现代*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底蕴深厚*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亲切*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商业化*	不显著	-
	有礼貌*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爱干净*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穿着得体*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有公德道德*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主动友好*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值得信赖*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民族自尊心强*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瞧不起中国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勤奋*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认真*	不显著	-
	易冲动*	不显著	-
	偏激*	不显著	-
对中韩关系的评价	中韩民间关系好*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高
	中韩关系好*	不显著	-
韩国经历	韩国旅行生活经历**	不显著	-
人口统计学变量	学历***	显著	高学历人群的韩国好感度较低
	性别****	不显著	-
	年龄层*****	不显著	-

注1:* 此类变量在问卷中的选项为“非常正确”、“正确”、“一般”、“不正确”、“完全不正确”，对这些变量与韩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2:**此变量在问卷中的选项为“没有去过中国”、“有中国观光经历”、“有短期访问经历(3个月及以下)”、“有长期访问经历(1个月以上)”，对这些变量与韩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3:***对于此变量与韩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T-test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4:****此变量的值为“19-29岁”、“30-39岁”、“40-49岁”、“50岁以上”，对此变量与韩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5:*****此变量的值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大学毕业或在读”、“硕士以上毕业或在读”，对此变量与韩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6:此表中所谓“显著”的意义为：对自变量群中的问题给出不同回答的被访者人群之间，其韩国好感度的平均值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①中韩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所带来的影响

韩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是决定其能否获得好感的重要原因。

以上统计结果显示，认为韩国“经济发达”、产品“质量好”、“新颖”、“美观”的被访者，其韩国好感度更高。与此同时，中国被访者虽然从富裕程度、民主程度、环保等多个角度对韩国社会进行了评价，但是与韩国好感度有关的变量为“富裕”、“干净整洁”、“教育水平高”这三个，而这三个变量都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都得到了被访者们较高比例的认可(详见图1和图5)，因此，韩国较之中国更先进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

韩国好感度的加分因素^①

中韩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有可能是阶段性现象，如果两国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韩国好感度的这一加分因素有可能减弱。中国被访者中高学历者的韩国好感度低于低学历者，而且其对韩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相对较少，由此也可以推测，如果两国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发达先进”这一韩国好感度的加分因素有可能减弱。

②中韩人文交流活动带来的影响

中韩文化交流对韩国好感度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中韩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历史，两国民众在认识对方文化时明显区分了古代文化和当下流行文化。今天，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中国被访者对此普遍认可，他们之中认为韩国文化时尚、浪漫、精致的比例很高(详见图7)，韩国文化的这些优势起到了为韩国好感度加分的作用。中国人虽然承认当下的韩国文化产业走在韩国之前，但看待韩国时还是持有亚洲文化宗祖国的自尊心。体现在本研究结果中，中国被访者并不认为韩国文化算得上“大气”、“高雅”、“有深厚文化底蕴”(认为韩国文化“大气”的占7.7%，认为韩国文化“高雅”的占19.6%，认为韩国文化“底蕴深厚”的只占28.5%)，韩国文化不够“大气”、“高雅”，算不上“底蕴深厚”的特征又成了韩国好感度的减分因素。但是中国被访者还是广泛认为韩国文化融合了传统与现代，韩国文化的这一特点起到了为韩国好感度加分的作用。与此同时，韩国文化中的传统要素还使中国人对其产生了亲切感，而对韩国文化的亲切感也使中国人的韩国好感度上升。

韩国人对韩国好感度的影响也是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国民的平均文化程度比中国高，很多中国被访者也认可韩国人较高的个人修养，认为韩国人“爱干净”、“穿着得体”、“有礼貌”(分别占71.3%、65.3%、67.6%)，这些都成为韩国好感度的加分因素。但是中韩之间存在的传统文化之争以及部分在华韩国人因为韩国发展程

度较高而表现出的优越感使中国被访者认为韩国人过于傲慢(认为“韩国人自尊心强”的占85.3%,认为“韩国人瞧不起中国”的占50.5%)。在华从事商业活动的韩国人中中小企业主较多,其中不乏在韩国缺少竞争力而转移到中国的企业,他们的商业信誉与日本欧美等外商相比较低,例如中小企业“连夜逃跑”的现象就一度使韩国企业形成了不好的口碑。受此影响,认为韩国人“值得信赖”的被访者仅占16.7%。韩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与“不可信”(85.8%)成了韩国好感度的减分因素。

无论是从对韩国文化的评价中还是从对韩国人的评价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人看待韩国具有明显的“自尊心受伤感”,这是韩国好感度重要的减分因素。中韩人文交流中存在着这种“自尊心之争”不是偶然性现象,反应的是两国的社会文化心态,今后很有可能是长期影响中韩民间感情的因素。两国国民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对两国的交流历史有不同的认识。中国人认为朝鲜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得到中国的庇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今天仍希望周边国家承认并尊重中国历史上“文化宗主国”的地位。但韩国人认为“朝贡”只是外交关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康竣荣,2005),韩国人的历史认识早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就开始脱离中华秩序,主张“民族史观”。“民族史观”强调韩国文化的优秀性,将古代的韩中关系解释为屈辱的受迫害的关系(王元周 2009, 154)。受这种历史认识的影响,韩国人虽然承认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强调韩国文化的独创性,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韩语的“去汉化”以及汉城更名为“首尔”都是这种思潮的表现。在野史学界⁵⁾更是提出“大陆史观”,将其祖先活动的舞台和成就进一步扩大,甚至主张一些古代文化是由朝鲜半岛流入中国⁶⁾。在野史学界的很多主

5) 王元周(2009)在“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中对在野史学者的定义如下:在野史学者,是指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的历史研究机构之外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一些学者,广义的在野史学者也包括那些在大学或正规历史研究机构工作,却相信《桓檀古记》等伪书的史料价值,肆意曲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非主流讲坛学者。

6) 王生(2010, 36-41)中指出 在“试析当代韩国民族主义”,受北方史观的影响,韩国人认为中国

张因为缺少确凿的历史依据而未被韩国人普遍接受，但其重新刻画韩国人英雄祖先的做法迎合韩国人的民族主义，韩国采纳檀君建国神话而采用檀君纪年就是受在野史学界影响的一个表现。“檀君建国说”取代朝鲜半岛祖先来自中国的“箕子东来说”，这又是韩国在历史文化上“去中国”并重建民族英雄的一个表现(李扬帆 2009, 44)⁶一方面是中国人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民族自豪感日益高昂，要求韩国承认古代曾经存在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文明秩序”，一方面是韩国人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希望重塑本民族辉煌历史，这两种相对抗的心态和情绪很可能促使两国民众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在人文交流中展开“自尊心之战”，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好感度。

被访者们对中韩关系整体的不同评价对韩国好感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认为中韩民间感情差的人群其韩国好感度更低⁷，这也再次证明了中韩之间历史文化“自尊心之战”对中国人韩国好感度的负面影响。笔者还通过交叉分析发现，高学历人群中认为韩国文化缺乏“文化底蕴”，韩国人“民族自尊心强”的比例更高，自尊心对抗更多的存在于精英阶层中，这一现象更加令人担忧。

(2)影响韩国被访者中国好感度的因素

为了了解构成“中国认识”的各种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笔者进行了T-test 或者ANOVA分析，分析结果概括总结为〈表2〉。

东北三省历史上是韩民族的舞台。在“造史”运动下，韩国出现了对延边提出领土要求的潜流。2004年，韩国59名议员提出过“《间岛协约》无效决议案”，2009年又有50名议员联名提交类似法案。李花子(2007)则在“朝鲜王朝的长白山认识”一文中介绍了作为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如何因为朝鲜王的政治需要被叙述为其太祖的诞生地，又被视为朝鲜风水地理中的诸山之宗，最后在日本殖民地时期被作为象征朝鲜民族独立精神的灵山。以上两个案例都说明韩国民族史观与中国的亚洲历观之间存在冲突，这些冲突使韩国人认为中韩之间存在领土争端。

7) 在中国，出现“日韩流”等对韩负面感情的主要原因就是围绕端午节等共有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争。

〈表2〉“中国认识”变量群与中国好感度变量之间的T-test、ANOVA分析结果

	“韩国评价”变量群	与韩国好感度变量的关系	
对中国经济的评价	成长快*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发展质量低*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规模大*	不显著	-
	潜力大*	不显著	-
	前景好*	不显著	-
	发展不均衡*	不显著	-
对中国产品的评价	质量差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技术水平一般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价格低	不显著	-
对中国社会的评价	自由开放**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贫富差距**	不显著	-
	社会治安**	不显著	-
	环境保护**	不显著	-
对中国文化的评价	亲切*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历史上对韩国影响大*	不显著	-
	韩国更好地传承了儒家文化*	不显著	-
	中秋与春节源自中国*	不显著	-
	多样*	不显著	-
	华丽*	不显著	-
	时尚*	不显著	-
	有独创性*	不显著	-
对中国人的评价	脏/干净***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懒惰/勤奋***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自我中心/顾及他人***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是否可以信赖***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民族自尊心强/弱***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低
	是否精于算计***	不显著	-
	阴险/坦诚***	不显著	-
对韩关系的评价	朝核问题中作用积极*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中国支持朝半岛统一*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的影响****	显著	持肯定意见人群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中国是军事威胁*	不显著	-
	韩国最大贸易顺差国*****	不显著	-
中国经历	中国旅行与生活经历*****	不显著	-
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	不显著	-
	年龄层*****	不显著	-
	学历	不显著	-

注1:* 此类变量的值为“非常正确”、“正确”、“不正确”、“完全不正确”,对这些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2:** 此变量在问卷中的选项分为非常否定、否定、一般、肯定、非常肯定5类,对这些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3:*** 此类变量在问卷中的选项分为两类,对于这些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T-test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4:**** 此变量的值为“利大于弊”、“利弊各半”、“弊大于利”,对此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5:***** 此变量在问卷中的选项为“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对此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6:***** 此变量的值为“没去过”、“观光过”、“出差过”、“派遣工作过”、“留学过”,对此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7:***** 此变量的值为“19-29岁”、“30-39岁”、“40-49岁”、“50岁以上”,对此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8:***** 此变量的值为“初中以下”、“高中毕业”、“大学以上”,对此变量与中国好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进行了检验。

注9:此表中所谓“显著”的意义为:对自变量群中的问题给出不同回答的受访者人群之间,其中国好感度的平均值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① 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中韩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中国人韩国好感度的加分因素,同时也是韩国人中国好感度

的减分因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低、产品质量差、产品技术水平一般的被访者比例都非常高(分别占被访者的45.6%、67.5%和50.7%),这些被访者的中国好感度较低。访谈发现,被访者们因为较差的中国产品使用经历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人唯利是图、缺乏诚信。但是韩国被访者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被访者中有97.2%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快,这些被访者的中国好感度较高。

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主要面向低端市场。中国制造在韩国成为低质廉价的代名词,尤其是关于中国劣质食品的报道让韩国人感到恐慌。随着将来中国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中国产品低质廉价的形象长远来看会逐渐改善。

② 政治制度差异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尖锐对抗虽然已经消失,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仍存在着价值观差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包容度已经很高。体现在本研究的结果中,社会制度差异不影响中国被访者的韩国好感度。但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存在着视社会主义制度为异己的现象,现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就主张与美国存在“价值同盟”。在朝半岛,冷战仍未完全结束,访谈发现,认为中朝社会主义同盟与韩美资本主义同盟为敌的思维也仍然存在。朝半岛的这一特殊性使得韩国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更多的偏见和警戒。尽管相比其他国家,韩国人对中国比较熟悉,他们认识到实施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与朝鲜不同,但调查结果仍然显示,认为中国社会自由开放度“高”的仅占22%,38.8%的被访者回答“一般”,认为中国社会自由开放度“低”的占39.2%。韩国被访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降低了他们的中国好感度。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有较多中国经历的被访者与没有中国经历的被访者相比,他们对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层的被访者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⁸⁾也就是说,韩国被访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很可能不会随着中韩交流的增加或者世代更替而减弱,两国间的社会制度差异很可能长期影响韩国人的中国好感度。

③ 人文交流的影响

49.5%的韩国被访者因为中韩文化之间的历史亲缘而对中国文化持有亲切感,对中国文化持有亲切感的被访者的中国好感度偏高。换言之,

8) 交叉分析的结果显示,有中国“留学、派遣工作、出差”经历的被访者与仅有中国“观光”经历的被访者以及没有中国经历的被访者,他们对中国社会开放度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交叉分析的结果同样显示,19-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以及60岁以上被访者对中国社会开放度的评价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中韩之间的文化亲缘性是中国好感度的加分因素。

中韩历史文化亲缘对中韩民间感情既会产生积极影响也会产生消极影响。调查显示,对于中韩共有的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66.6%的韩国人不认为其源自中国,这与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古代亚洲文化宗主国的思维不同,这样的认识差异很可能在今后再次引发类似“端吾节之争”的争端。中韩两国对古代交流史的不同看法也曾危害中韩关系。2004年和2006年,中韩学术界围绕“高句丽历史归属”的争端曾经两次成为韩国社会的热点,韩国社会无法接受中国学术界把“高句丽史”看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有的学者和媒体不同意中国重视“高句丽”研究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认为中国“偷窃韩国历史”,“为将来可能发生的领土争端做准备”,甚至认为“中国觊觎朝鲜领土”(王晓玲 2008, 286)。这一历史争端一度上升为政府间议题,最终通过政府间协商达成口头谅解。很多韩国学者指出“高句丽历史归属争端”之后韩国民众的中国好感度急转直下。⁹⁾ 中韩高句丽历史争端至今并未得到完全解决,类似争端如果再次浮出水面,很有可能成为降低韩国人中国好感度的重要因素。而且韩国在“高句丽争端”之后加强了对中韩间历史争议的关注,设立东北亚历史财团,增加了对高句丽、渤海等历史研究的支援,韩国学者也更加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及清史等重要历史研究项目中与韩国相关部分的叙述。因此,中韩文化之间的历史亲缘性虽然起到提升中国好感度的作用,但“高句丽历史争端”之类的问题还有可能再次浮出水面,中国好感度很可能因此而降低。

韩国被访者在评价中国人时认为中国人脏、懒、自我中心而不顾及他人,这些评价再次反映了中韩之间的发展差距,可以说中韩之间的发展

9) 例如李希玉(2007)在“对东北工程政治化舆论的批判分析”一文中分析了2004年和2006年面向韩国国民的舆论调查结果,指出高句丽历史争端成为社会热点之时,韩国人的对华好感度都较低,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顾虑高于对美和对日的顾虑。禹政烨(2011)则比较了韩国人不同年份的中国好感度调查结果,指出发生高句丽争端后中国人的对华好感度大幅度下降。

差距体现为国民素养，再次成为中国好感度的减分因素。认为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强”的人群的中国好感度也更低，再次证明了中韩民众之间存在着“自尊心之战”。来自于中韩人文交流中的负面印象以及韩国社会固有的有关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阴险、精于算计等)使韩国受访者认为韩国人“难以信赖”。

④ 朝鲜因素的影响

问卷调查显示，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持否定和肯定认识的受访者的比例相当，50.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略高于认为中国起到消极作用的人群比例(45.2%)。本调查的实施时间为2010年2月。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韩国社会里批判过去10年的对朝“阳光政策”的声音增多，李明博政府对中国积极倡导的六方会谈给予消极评价，先后提出了“无核、开放、三千”以及“大交易政策(Grand Bargain)”，。但朝鲜反而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要求提高开城工业园区的租金，朝鲜军人还枪杀了误入军事禁区的韩国游客。因此，实施本调查时韩国社会对朝鲜的认识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持续恶化，对中国支援朝鲜的做法也有很多批评声音，但是2010年的“天安舰”以及之后的“延坪岛”事件对朝韩关系以及中韩关系的影响更大。两起事件之后，韩国社会认为中国偏袒朝鲜的声音高涨，中韩之间的信任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可以断言“天安舰”事件之后，韩国人对中国对朝政策的认识比实施调查之时更加负面。

韩国人把中国看作与朝鲜沟通的重要渠道，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促使其放弃核武器，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从而最终实现朝半岛统一。中国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但重视朝半岛的稳定，希望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韩国社会内部在对朝问题上存在着“阳光”与“高压”两种思路。进步派推行的阳光政策希望朝鲜感受到友好的国际环境，通过支援朝鲜发展经济使其渐渐走上改革道路，这种思路

与中国的对朝政策更接近。但保守派对朝鲜强硬，强烈批评朝鲜的内政与外交，重视通过韩美军事同盟抵御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要求中国在制裁朝鲜等国际行动中与韩美保持一致，持这一思维的韩国人对中国的对朝政策更加批判。已有经验证明，中国的对朝政策一贯性很强，韩国人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起作用的判断却与其对朝鲜的态度息息相关，与朝韩关系息息相关，与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息息相关。¹⁰⁾ 朝半岛冲突加剧以及保守思潮占据主流时，对中国威胁的忧虑增强时，韩国人对中国的对朝政策会更加不满，中国好感度也会受其累。朝韩关系较为平稳以及进步思潮占主流时，中国机会论占据主流时，韩国人的对华好感度会随之上升。

V. 结论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韩民间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两国国民之间的互相关注度不对等。对于中韩民间关系，韩国社会的关注远远高于中国。本研究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明显认识到韩国民众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韩关系等各方面均有自身的认识，但中国被访者对韩国的关注限于韩流、韩国产品等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内容。再例如2008年前后，韩国的媒体、专家以及政府曾经惊呼中国出现了“嫌韩流”，韩国的国会、驻华使馆和媒体等为此进行过很

10) 李熙玉(2009, 12)指出，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韩国存在着现实主义悲观论和自由主义乐观论两种思路。现实主义悲观论者认为中国会在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取代美国的地位，这会危害朝半岛和平稳定。而自由主义乐观论者认为中美之间即使出现权力转移也是平缓的，不会危及朝半岛的和平稳定。詹德斌(2011, 122-123)则进一步分析指出：现实主义悲观论者在“天安舰”事件后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会进一步要求驻韩美军撤离，会更积极地取代美国的影响力，对此，韩国应该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国靠近韩国。自由主义论者则认为“天安舰”事件中表现出的中韩矛盾是韩国对中国认识不足所致，韩国应该强化与中国的关系，通过改善朝韩关系增强与中国的合作。

多研究和讨论。但是本研究通过比较调查发现,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比中国人的韩国认识更为负面¹¹⁾,以日本为参照的情况下,韩国人的中国好感度明显低于中国人的韩国好感度,中国社会对此几乎没有关注。这种相互关注的不对等首先反映了两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差异以及大国与小国国际视野的差异。中国外交长久以来只重视大国无暇顾及其他国家,中国媒体关于国际事务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大国,这都是造成中韩国民之间了解程度不对等的原因。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双方的重视,如果一方热一方温,双方难以进行快速有效的沟通,势必妨碍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这提醒中国政府应该更刻意重视与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否则容易被误会为傲慢和强硬。而韩国应该避免在中韩外交中过度敏感,夸大中国意图。

其次,中韩国民之间的相互认识存在错位。韩国被访者对中国的评价比中国被访者对韩国的评价更负面,他们虽然知道中国发展迅速,但对中国的具体发展成就估计较低。在韩国被访者眼中,中国是落后国。但是中国被访者虽然承认韩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却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加自信,而且有更发达国家做参照,中国人并不因为韩国的发展程度而仰视韩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人习惯了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对中国的发展成果和未来非常自信。在看待周边国家时,中国人还具有亚洲文化宗主国的自豪感,希望得到周边国家的承认和赞许。在中国人的阶序排列中,韩国并不在中国之前。认识错位会使两国民众在互动中出现期待与回应不相符的情况,由此产生的挫折感会引发负面情绪。中国的迅速发展是引起这种认识错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认识错位在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持续存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国民更加自信,这值得肯定,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正确看待自身的发展水平,否则不利于中

11) 考虑到中国调查实施时间和样本构成的特点,平常年份里整体中国人的韩国认识应该比本调查结果更积极正面。换言之,中国人的韩国好感度要比韩国人的中国好感度好更多。

国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建立友好的国家形象。

再次，中韩国民之间的相互需求不对等。在中韩交流中，中国人的需求似乎很单一，就是希望得到韩国的承认与尊重。面对同样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并且因为发展程度较高而具有优越感的韩国人，中国人认为韩国人午慢，这是中国人对韩负面情感的主要原因。然而韩国人对中国的需求更多，重视中国在朝半岛和平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还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明确认识双方间的相互需求，有利于两国在交流中进行高效互动。

分析危害中韩民间好感的负面因素，其中有一部分是误解造成的，有一部分则是立场差异造成的。为了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双方需要努力澄清误解，认清立场差异并积极应对。

韩国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是降低其中国好感度的原因之一，熟悉中国的韩国人对中国自由开放程度的评价不比普通韩国人高，可见之所以形成这种偏见，根本性的价值观差异要大于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被世界所接受，还需要更长时间，需要通过更多的发展成就来证实。现阶段为了不使社会制度差异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障碍，中国应该积极说明自身的发展道路，讨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路径以及东亚文化的特性，减少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国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和不安。

中韩在对朝鲜认识上存在的差异也是降低韩国人中国好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对朝政策问题上，韩国民众对中国既有误解又有立场差异。调查显示，韩国被访者中认为中国不支持朝半岛统一的占了91.1%，认为中国对韩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占79.8%，否认中国积极解决朝核问题的占49.3%。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无核化以及排除外部势力实现和平统一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中国的这一立场并不被普通韩国人所熟悉。如果韩国把统一作为其重要的民族使命，不仅专家们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态度，全社会都应该对此持有基本知识。因此，对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安全和统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无论是为了中韩关系还是为了朝半岛

统一，韩国舆论都应该进行正确引导。在如何引导朝鲜弃核并走上发展与开放这一问题上，中韩之间存在着立场差异。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对朝实施高压政策，强化与美国的安保同盟。有学者提出，特别是“天安舰事件”后，韩美的朝鲜政策已经从弃核谈判转向防范、遏制和改变朝鲜的“威胁行为”，主张对话的中国已经被边缘化(朱峰2011, 7-14)。但“天安舰事件”后，韩国也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欠缺，在金正日逝世以及朝鲜发射卫星等事件发生后，双方的沟通与合作有所增强。事实证明，无论在对朝政策上中韩两国的立场差异多大，中韩都必须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合作，因此两国应该进一步了解对方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在发生类似危机时能够更圆满地处理，最大限度地维护两国社会之间的基本信赖。

中韩之间的人文交流对双方的相互好感度同时产生着影响。回顾中韩之间的历史文化之争，有过误解，但确实也存在明显的立场差异。中国媒体的一些错误和片面报道曾进一步促使中国人认为韩国抢夺中国文化，而韩国媒体以及部分专家对于中国东北工程过度政治化的解释也使韩国人对中国产生了不必要的敌对意识。抛开这些误解，两国国民确实都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在看待两国交流史时存在立场差异。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团结都起着积极作用，但在中韩交流中我们应该努力避免民族主义产生消极作用，不使这一因素影响到两国在政治、安保以及经济合作领域里的利益，不使其动摇中韩长期友好关系的根基。为此，我们应该注意和引导媒体的相关舆论，发生历史文化争端时，双方应迅速进行沟通，并避免学术问题的政治化。但要从根本上化解中韩之间的历史文化争端，还应该使两国国民了解彼此之间的视角差异。即便双方立场短期内难以磨合，也应该倡导两国国民冷静地围绕这些争议不断展开对话、进行换位思考。有学者分析高句丽历史争端的始末后指出，中韩政治合作的需求降低时，高句丽历史争端就更加激烈(李熙玉 2007, 10-11)，这一现象令人忧虑。政府间的合作在

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可能时而紧密时而疏远，但民众间的敌对情绪一旦形成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最终将动摇中韩合作的基础。中日关系以及韩日关系中都存在民间负面感情这一瓶颈，中韩关系应该以此为鉴，在文化交流中更多的利用和发挥文化亲缘性所带来的积极效果，警惕在文化交流中掺入过多政治因素，不使中韩关系背上莫须有的历史包袱。

[투 고 일 : 2012년06월16일]

[심사완료일 : 2012년07월19일]

[게재확정일 : 2012년08월09일]

参考文献

- 강준영(康埈榮). 2005. “중국의 고구려사 인식이 한중관계에 미치는 영향-‘동북공정’을 둘러싼 양국의 역사 인식을 중심으로.” 『중국 연구』36: 201-214.
- 이희옥(李熙玉). 2007. “동북공정의 정치적 논란에 비판적 해석.” 『동아연구』53: 10-11.
- 이희옥(李熙玉). 2009. “한국에서의 중국 부상의 성격: 시각과 실제.” 『한국과 국제정치』25(4): 1-29.
- 우정엽(禹政燁). 2011. “한국인의 중국 인식.” 『한중청년포럼』.
- 李花子. 2007. “朝鲜王朝의长白山认识.”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 126-135.
- 李扬帆. 2009. “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 『国际政治研究』1: 44.
- 王生. 2010. “试析当代韩国民族主义.” 『现代国际关系』2: 36-41.
- 王晓玲. 2008. “韩国报纸上的中国形象-以1992至2007年的东亚日报为例.” 『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8』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86.
- 王晓玲. 2009. 『中国人心目中的韩国形象』北京: 民族出版社: 81-87.
- 董向荣 王晓玲 李永春等. 2011. 『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04.
- 王元周. 2009. “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 『国际政治研究』4: 154.
- 詹德斌. 2011. “‘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反思.”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6: 122-123.
- 朱峰. 2011. “后天安舰时代半岛无核化进程评析.” 『现代国际关系』10: 7-14.

ABSTRACT

A Study on China-Korea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mpression Factors

Wang Xiao 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wo questionnaire surveys. It compares the China-Korea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mpressions of each other,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impres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Korean surveyed consider that China is a backward country in many aspects,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trust China and the Chinese. Moreover,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ocialist China needs to be more open, all of which worsens the public impression of China. But the Korean polled say that China develops quickly, and they feel good of Chinese cultures, which improve their impression of China. The Chinese surveyed consider Korea a leading country in many aspects, which improves the good impression of Korea. While praising the Korean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Chinese polled think that the Korean traditional cultures have been deeply impacted by Chinese cultures, and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own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y also think that the Korean have a very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and such strong nationalism has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mpression.

Keywords Public Opinion Survey, Mutual Understanding, Impression Factors